

经济学迫切需要辩证思维

——学习总书记 4.19 讲话心得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4.19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迫切需要学习和运用辩证法,大力提倡辩证思维实在是当务之急。”

陈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4.19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迫切需要学习和运用辩证法,大力提倡辩证思维实在是当务之急。例如在讲话的第五个问题中,谈到了“增强互联网企业使命感、责任感,共同促进互联网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对此,他明确提出了要坚持三个“并”:

“鼓励支持和规范发展并行”,“政策引导和依法管理并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

重”。这三个“并”及其所体现的思维逻辑,值得每一个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与政策讨论的人深思。

回顾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领域中形而上学和绝对化的现象并不少见。例如“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是经营的唯一目标”等等。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唯利是图”似乎是有理的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似乎不能再提了,“点击率第一”、“收视率第一”、“码洋第一”等等则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现象的产生无疑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但是,理念和思想方法上偏颇无疑是重要的、根本性的原因。“只有”、“唯一目标”、“越少越好”这些典型的绝对化的用语,在社会上产生了众多不良影响,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哗众取宠心态固然是产生这些现象的一种诱因,但是从根本上说,则是由绝对化的传统思维方式导致的。从来没有人只用一只手做事情,然而一说到经济政策的讨论,一些人就主张只能用“看不见的手”,不能用“看得见的手”。这不是违反常识的咄咄怪事吗?

总书记在讲话中还非常具体地点出了四种突出表现:“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

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请注意这里的用语:“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这里再一次体现了辩证的思维方法。不是完全不考虑点击率,而是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我们不妨对比一下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思维方法。

人们的行为是受理念和思维方法指导的,对于经济管理工作来说,关键的人是公务员和企业家。经济学理论的任务就是为这些人提供理念和思维方法。说得具体一点,经济学就是要帮助人们,正确地理解经济和社会这个复杂系统的运作和发展的规律。在这个基本点上,可以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思维,往往导致把好的政策念歪,在做好事的名义下做坏事。几十年来,从大跃进到强迫拆迁,我们见到的还少吗?有人说,什么“兼顾”、什么“并举”,实际操作太难,不如“一刀切”方便、省事。这倒是真的。形而上学和绝对化是懒人的防空洞和避风港,是上推下卸的最聪明的办法。按辩证法做事,就必须老老实实地研究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做出决定,并加以实施。用这样的标准考察一下今天的经济学,

包括理论研究和教学,实在差得太远。众多西方的经济学家,例如布坎南、斯蒂格里兹等,对此都早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科斯更是明确地指出,现在课堂上讲的是“黑板经济学”。我们现在的经济学,究竟在向学生灌输什么样的理念和思维方法呢?我曾多次问过学生,你们学了那么多经济学的课,最深的印象什么?结果是令人震惊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刚才提到的那些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理念,已经灌输到我们的学生中间,而他们将是今后几十年,决定中国未来的公务员和企业家、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

因此,为了落实新的发展理念,经济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教学急需进行改革,急需大力提倡辩证法,清除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思维方法的种种影响。没有这样的正本清源的改造,我们的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就无法适应新时期的现实要求。

写到这里,又读到习近平总书记 5.17 关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备受鼓舞。(我认为),经济学的革新在各学科里恐怕应该是最为迫切、最为急需的。我们建议,以学习总书记的两次讲话为契机,从理论研究入手、以教材和教科书的编写为目标,把我国经济科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不可错点鸳鸯谱：美元与英镑的走势

通常来说,高盛之类的美国投行如果预测一个商品涨价,那么这个商品通常就会跌价;反之这个商品通常会涨价。高盛之类的报告,是典型的坐庄报告。不信高盛,得永生。

程碧波

最近美元和英镑引人注目,高盛看跌英镑。自从 2015 年 11 月以来,英镑的贸易加权指数累计已经下跌 8%,而英国一旦最终投票退出欧盟,英镑的下跌幅度可能高达 15%至 20%。与此同时,高盛看多美元。高盛认为美元下跌已经结束了。美元上周出现 6 个月以来最大上涨,4 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跌至 7 个月新低也未能阻止其涨势。高盛表示,非农数据公布后美元上涨表明,市场对经济增长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下降速度过快、幅度过大,为美元反弹创造了条件。

然而,高盛的报告是典型的反向指标之一。通常来说,高盛之类的美国投行如果预测一个商品涨价,那么这个商品通常就会跌价;反之这个商品通常会涨价。高盛之类的报告,是典型的坐庄报告。不信高盛,得永生。

抛开对高盛之类报告本身的评价,我们可以从更多更翔实的证据,对英镑和美元的未来走势做出相当准确的判断。

当前市场看跌英镑的理由在于 6 月份英国举行的公投中,英国可能退出欧盟。如果届时英国公投退出,那么英国经济将会衰退,资本将会流出,英镑将会继续大幅度贬值。然而这些理由是错误的。英国之所以希望退出欧盟,乃是因为本人在 2008 年出版的《财富战争》中所指出:欧盟的货币体系自身有根本性的缺陷,这种缺陷就是欧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分离。两个政策分离的结果是,欧盟各国政府产生了大量的财政赤字——而产生财政赤字的原因,是由于各国政府失去货币发行权。欧盟各国要摆脱这种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解散欧盟,或者通过战争统一欧盟财权。而英国明智地考虑了退出欧盟。这是英国正确的选择。

既然退出欧盟是英国的正确选择,那么退出欧盟将会使得英国经济更加健康。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英国公投后没有退出欧盟,既然没有退出欧盟,那么高盛等鼓吹的后果更不会发生了。因此,英镑在未来一年内,虽会有波动,但总体应处于上升区间。

相形之下,美元就没有那么乐观了。美元之所以不乐观,是因为美国在根本上难以允许美元长期升值。二战以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长期处于贬值趋势,以此获得铸币税收入。自 2010 年以来,美元已经连续升值了 5 年多,美国不会容忍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近期美元虽然有较为快速的下跌,但下跌幅度还不够大。这几天美元的升值,在高盛看来是美元触底回升,然而事实上其恰好可能是短暂的反弹而已,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美元的继续贬值。至少未来一年内,美元的较大幅度贬值是极为可能的。

而美元若是计划贬值,其最好的办法就是透出各种风声,包括通过高盛等渠道向外传送美元要升值的信号,吸纳更多的接盘者。此即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兵法要义。

有朋友会问,美元贬值,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看多人民币?对此,笔者要指出,一种货币的升值与否,是相对的。若某货币贬值,而另一种货币贬值更厉害,那么前种货币相对后种货币就仍然是升值。笔者这里所说美元贬值,乃是指美元相对英镑、欧元等货币的贬值,至于美元未来相对人民币是否贬值,不在本文阐述之内。

国际金融市场,波急浪险。在这个金融市场中冲浪,就一定要把准波浪的节律,抛开杂波的干扰,看透海洋深处的浪涌。迷惑于海妖的歌声,甚至把对手释放出来的歌声认为是纯洁的天籁之声,最终恐怕是把自己的小船翻掉。

后营改增时代:应重塑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朱为群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财税一大要点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营改增全面铺开对于这一关系有何影响?现行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的分享体制是以 1994 年的分税制为基础并经历了多次调整后形成的。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规定,根据事权与财权结合的原则,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首先,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须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其次,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此外,分设国家与地方两套税务系统,国家税务系统负责征收中央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地方税务系统负责征收地方税。应该说,这次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不仅摆脱了长期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规则的不稳定和不规范,还引入了现代财政分权治理的理念,从而向财政法治化国家迈出了坚实和重要的一步。

然而,由于国家政体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央和地方在事权划分方面没有做出更为清晰的划分,省以下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分享体制缺乏规范性原则的约束,从而向财政法治化国家迈出了坚实和重要的一步。然而,由于国家政体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央和地方在事权划分方面没有做出更为清晰的划分,省以下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分享体制缺乏规范性原则的约束,从而向财政法治化国家迈出了坚实和重要的一步。然而,由于国家政体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央和地方在事权划分方面没有做出更为清晰的划分,省以下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分享体制缺乏规范性原则的约束,从而向财政法治化国家迈出了坚实和重要的一步。然而,由于国家政体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央和地方在事权划分方面没有做出更为清晰的划分,省以下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分享体制缺乏规范性原则的约束,从而向财政法治化国家迈出了坚实和重要的一步。



分、地方税体系建设等改革进展情况再研究是否适当调整。虽然这是一份过渡性的短期改革方案,但必将对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乃至省以下地方各级财政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增值税收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享比例及其基数选择,虽然直接影响到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但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已。因为这个比例或者基数本身并不能说明其合理性。从学理上说,能够支撑中央和地方财政利益关系合理性的,既不是上年或当年的收入基数,也不是未来年度可预测的某个或某几个相关因素,而是其背后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的合理性基础。在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主要涉及全国公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地方公众局部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这种利益冲突,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支撑和引导。

从理上说,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利益关系,首先需要合理划分不同政府之间的事权,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将财政资源与事权相匹配。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良好的事权划分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自主的独立性,以保证其所代表群体局部利益的独立性;二是中央

政府能够对地方进行控制和管理,保证地区发展的平衡。在事权的分配上,根据决策的主体不同划分,地方政府的事权可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地方根据本地情况自主选择的事权;二是地方政府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必须承担的法定事权;三是地方政府接受中央和上级政府安排本级政府的委托事权。由于不同的事权体现出不同性质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利益关系,因此需要依据不同的原则配置相应的财政资源。

首先,对于地方政府自主决策的事权,应该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来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因其所涉及事项的完全由当地居民享受,因此其相应成本应该由当地居民来承担。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对于地方自主决定的公共事项,如果涉及到当代和下代人共同利益的,则可以通过发行地方建设公债的方式来筹集必要的资金;如果涉及本地当代全体或部分公众共同利益的,则可以通过地方税或者地方公共收费等方式来筹集资金。

其次,对于地方政府承担的法定事权,应该遵循“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原则”分别以下三种情况来处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一是如果此类法定事权的履行不能形成有利于当地公众的地方公共利益,则其

财力应该全部由中央政府提供,当地公众不应该承担任何成本;二是如果地方政府能够从中受益,则应该按照受益的程度来分担此法定事项的成本;三是如果当地公众不仅没有任何受益反而遭受利益损害,则中央政府不仅要承担此法定事项的筹资成本,还要根据受害的程度给予当地公众相应的补偿。

再次,对于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委托当地政府的事项,由于决策权在中央或上级政府,地方只是按照委托方的要求去做,就应该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原则”来处理此类公共事项所涉及的利益关系。由于此类事项主要服务于上级政府,与当地民众的利益相关度不够紧密,相关支出责任理应由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来承担,因此其所需的财政资源也理应由中央或上级政府来提供,而不应该增加当地居民的负担。

在操作层面,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要从厘清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着手。长期以来,中国在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方面,重点一直在中央和省级政府层面,而对于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却并未纳入规范化的视野,从而在现实中不仅有着很大的地区差异,而且也出现财政资源有向上集聚的倾向,导致基层政府财政资源的不足,从而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难以实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要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问题的处理思路从“自上而下”转变为“由下而上”,即从最基层的政府或者公共组织开始,按照行政、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环境保护、道路建设等不同的公共管理功能,逐一梳理不同性质的事权类型,以前述理论思路为指导,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扎扎实实地尽可能划分清楚基层各级政府的事权,并在此基础逐步调整财政资源的配置,使其相互对应,通过法治化的途径加以确认和稳定。随着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政资源的匹配一致和良好运作,上层政府财政关系的妥善处理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2015 年美国成全球反倾销诉讼最大发起国

研究显示,美国已经取代印度成为反倾销和其他贸易保护案件的最大发起国,而中国及其钢铁行业正是美国的最大目标。该数据突显出,某些工业部门对它们认为来自中国对手的不公平竞争感到日益担忧。该研究的公布正值美国政界反中国言论日益增加之际,此外,今年夏天 3 起针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产品的政治敏感反倾销案件即将作出裁决,可能导致美方对中国企业施加高达 500% 的惩罚性关税。

但是,这些进展也指向美国和欧盟在利

用此类案件上的巨大差异,欧盟目前正在讨论的是否要赋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一让步会使对中国提起反倾销案变难。

一年一度的《全球贸易保护报告》显示,2015 年美国企业发起了 43 起反倾销案件,以及另外 22 起旨在征收反补贴税的反补贴调查。美国在这两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超越了分别在 2014 年和 2013 年发起最多案件的印度和巴西。

2015 年,欧盟仅提起了 12 起反倾销案,

较前一年减少了 2 起。根据 WTO 的数据撰写该报告的反倾销专家克里斯蒂·斯蒂文森称,美国反倾销案件激增主要是因为钢铁行业。这一增长也表明,美国企业热衷提起反倾销诉讼的对象从中国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英国和荷兰等国。

2015 年,全球范围发起的 233 起反倾销案件中,针对金属行业的案件占比达创纪录的 46%,几乎全部是针对钢铁行业的案件。在美国发起反倾销案件比在欧盟容易得多。在欧盟,企业必须先通过公众利益测试。但是,

斯蒂文森称“这或许反映出美国在保护本国钢铁制造商方面比欧盟更大胆”。

美国和欧洲钢铁行业指责中国受到高额补贴的钢铁部门向全球市场大量输出钢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倾销”,拉低了国际价格。近年来钢铁价格暴跌已经造成从澳大利亚到英国、乃至美国部分工业中心的全球范围的工厂大量倒闭。

中国拒绝承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并表示正在努力解决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该问题变得日益尖锐。这一问题

也打击了中国在 WTO 框架内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努力。中国声称,在其加入 WTO 满 15 周年的今年 12 月,应当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如果中国获得了该地位,那么这可能影响美国等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案的能力,因为这将使它们不能用替代国的价格进行比价。

根据这份新报告,在过去 20 年里,印度是发起反倾销案最多的国家,在 1995 年至 2015 年间发起的 4990 件反倾销案中,印度发起了 767 件,占比为 15%。同期,美国发起了 570 件,欧盟发起了 480 件。(FT 中文网)